上海政治经济学

Shanghai Annals of Political Economy

年鉴 2019

张晖明 孟捷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政治经济学年鉴.2019/张晖明,孟捷主编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5
ISBN 978-7-5432-3114-6

Ⅰ.①上… Ⅱ.①张… ②孟… Ⅲ.①政治经济学-上海-2019-年鉴 Ⅳ.①F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59927 号

责任编辑 程 倩
装帧设计 路 静

上海政治经济学年鉴 2019
张晖明 孟 捷 主编

出 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
插 页 2
字 数 818,000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3114-6/F·1294
定 价 158.00 元

前　言

《上海政治经济学年鉴》是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从2018年开始组织编撰的年度出版物。编撰这本年鉴的宗旨，在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学理化，最终形成一个反映中国实际，且具一般理论意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和《上海政治经济学年鉴2018》一样，在编选本年度的论文时，我们尽可能顾及了不同领域、不同进路和不同层次的研究，并将所有论文按专题顺序进行了编排。这些专题既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的解读，也包括在学术—理论话语层面的研究。对当年度涌现的一些重要话题，如中国经济学范式研究、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等，均辟了专门的栏目，以反映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此年鉴也特地编入了几篇相关文章。

编　者

2020年5月

目　　录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增长70年 …… 荣兆梓　李艳芬(3)
新中国70年的经济增长:趋势、周期及结构性特征 …… 李帮喜　赵奕菡　冯志轩(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成果与中国特色企业理论初探 …… 张晖明(49)
公有资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荣兆梓(56)
“生活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胡乐明(7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渊源、发展契机与构建路径 …… 周　文　宁殿霞(8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迎接新经济时代的挑战? …… 任保平(100)

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奇迹”:一个经济学人对理论创新的思考 …… 夏　斌(113)
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
——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 …… 金　碚(131)

中国经济问题

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 孟　捷　吴丰华(157)
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 文　一(177)
生产性效率、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增长 …… 卢　荻　黎贵才(208)

中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修复机制研究 …… 李怡乐(222)

国家的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 …… 孟 捷(237)
国家规模的演进动因及经济结果
——一个长历史周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张晖明 张亮亮(253)

政治经济学原理

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利率决定理论和货币政策 …… 冯金华(277)
投资品部类的自主积累和增长在何种条件下是可能的
——基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考察 …… 冯金华 孟 捷(293)
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关系争论的评析 …… 李 翀(313)
国内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新趋势 …… 魏 峰(325)

数量政治经济学

生产结构、收入分配与宏观效率: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分析框架与经验研究 …… 李帮喜 刘 充 赵 峰 黄阳华(341)
世界再生产体系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 乔晓楠 张月莹 吴雨婷(357)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剩余价值率计算:理论与中国经验 …… 马梦挺(379)
生态不平等交换、价值转移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环境问题 …… 冯志轩 刘凤义(400)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战后“黄金年代”的终结和 1973—1975 年结构性危机的根源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种解释的比较研究 …… 孟 捷(425)
技术—经济范式演进与资本有机构成变动
——基于美国 1944—2016 年的历史数据 …… 杨虎涛 冯鹏程(452)

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方法论

“哈耶克矛盾”与“诺思悖论”:社会秩序自发生成演化抑或理性设计
建构的理论之惑 …… 韦 森 陶丽君 苏映雪(46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困境及其批判 …… 杨春学(483)
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争论为参照 …… 孟　捷(49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现实体现与发展路向
——兼论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先导意义 …… 任瑞敏　张晖明(506)

学术争鸣

对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兼评简新华对洪永淼的质疑 …… 王艺明　张兴祥(5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
——对王艺明和张兴祥评论我与洪永淼商榷文章的回应 …… 简新华(537)

学术书评

经济学与哲学的对话
——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周嘉昕(553)
劳动价值论研究的上海学派
——孟捷、冯金华《劳动价值新论——理论和数理的分析》评介 …… 张忠任　魏　峰(562)

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增长70年

荣兆梓　李艳芬*

摘　要　创新发展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形成“创新红利分享空间”，进而构成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劳动者主权的社会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动态路径使得共享发展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中国经济70年是符合劳动者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经济增长动态路径逐步展开的70年，高积累率与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相结合，造就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在此过程中，社会总剩余价值率经历了一个N字形的大起大落，当前正处于第二个上升期的顶部。文章讨论了积累过程的未来趋势，认为共产党领导加上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增长的动态路径还将继续在劳动者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而市场经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也会在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中通过技术进步路径的转换而逐步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统一，生产力提高与人的能力发展相互促进。

关键词　社会主义积累规律　创新红利分享空间　社会总剩余价值率　两极分化　技术进步路径

本文根据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验，讨论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核心是剩余价值率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代市场经济中，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增长必须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对于一个劳动者社会特别重要，只有增加人均产出量，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才有可能增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创新，我们的讨论从创新红利的分配开始。

一、基于创新红利的分析框架

(一) 创新与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表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理论。《资本论》中贯穿始终的劳动生产率

* 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李艳芬，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在读博士。

概念与创新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增长只靠投资是不够的，投入要素的效率需要不断提高，这当然要创新，就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包括一般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直接生产过程中机器的使用和改良，劳动组织方式的改进，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以及生产规模扩大，甚至还包括在流通过程中成本的节约、效率的提高，等等。但是，在展开以下全部讨论之前，需要强调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概念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创新概念有很大区别。现代经济学所谓企业创新其实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型创新”（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另一种是“寻租型创新”（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①前者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大体吻合，与本文所谓创新涵义基本一致；后者则涉及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在社会阶级、阶层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是一种设法从蛋糕里多分一点的“创新”。②本文所用创新概念与后者无关。第二，市场经济的创新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阶段，一个阶段谓之“领先性创新”或曰狭义创新，是新生产方式的发明、创造和率先运用；另一阶段是跟随创新，学习和模仿领先创新的成果。此类活动也属于广义创新的范畴是因为：其一，这是创新推广的必要阶段，从全行业、全社会的角度看，没有这个创新推广环节，生产力的提高十分有限，创新过程就是不完整的。其二，学习和模仿并不是纯粹的原样照搬，引进技术涉及时空差异要求对新技术的调适，其中包含了边际创新。进一步说，创新活动大多数本来就是前人创新成果基础上的边际推进，累积的微量创新完全可能演变为新一轮领先创新，二者间并没的绝对的界线。③总之，本文所用创新概念与提高劳动生产力内在一致。创新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手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因此，我们以创新为起点，以创新红利的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考察的起点。

（二）创新红利空间与利益分割点

有创新就会有创新红利。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如何理解创新红利？图 1 给定社会劳动总量不变（同等长度的线段表示相同劳动时间），以不变价为标尺刻度社会总产出（实物量），考察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期（T_0 与 T_1）社会产出的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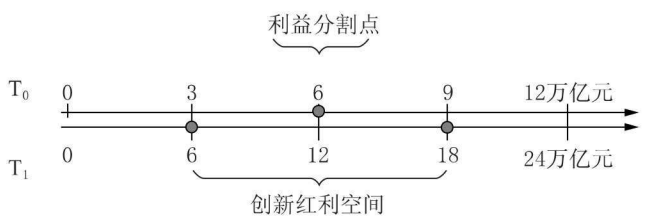


图 1　创新红利空间与利益分割点

T_0 期社会总产出 12 万亿元，到 T_1 期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同样的社会总劳动生产的产

① 参见威廉·鲍莫尔等：《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中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5—105 页。

② 例如很大一部分“金融创新”就属于这种类型。

③ 斯蒂格利茨：《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版，第 38 页。

品实物量增长一倍。用 T_0 期的不变价计量，12万亿的总产出增加到了24万亿。T_0 期劳动生产率较低，社会产品有一半，即6万亿元必须用于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消费，劳动者个人与社会的收益分割点在6万亿元处，这个社会总体的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比例）是100%。那是一个比较穷的社会，只有6万亿的物质产品可以用于公共消费和积累。假定非生产劳动部门耗费加公共消费占国民收入的35%，积累率最多只能达到15%。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按不变价计算的产品实物量会不断增加。假定劳动生产率翻番，同样的社会劳动总量能够生产出24万亿的物质产品。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出实物量增加了12万亿，这增加的12万亿就是创新红利。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问题，再假定从线段左端向右延伸为劳动者个人所得，从线段右端向左延伸为包括资本积累在内的社会公共所得，二者交汇处为收益分割点，那么，创新的红利分享空间就是在线段 T_1 上的6万亿到18万亿之间，利益分割点可以在这个空间内任意一处。这个空间的物质产品是创新提供的，总共12万亿的产品是它的增加量，可以在劳动者个人与社会之间进行分配。极端情况下，以线段6万亿处为收益分割点，它意味着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消费生活水平不提高，全部创新红利归社会所有，剩余价值率为300%，剩余价值占国民收入的75%，扣除非生产劳动部门耗费加公共消费之外可以有很大的比例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假定非生产劳动部门耗费加公共消费仍占国民收入的35%，则积累率可以推高到35%。另一个极端是，假定社会所得不变，仍然为6万亿实物量，收益分割点落在 T_1 线段18万亿处，这样，劳动者的消费生活水平提高到之前的三倍，从原来的6万亿增加到18万亿。但是，公共收益物质量不变，积累率很难有所提高，增长也难以加速。这是两个极端情况，实际的分配应该在两个极端之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红利分享空间。当然，这是从一个劳动者社会的角度来看的。劳动者社会的生产目的就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劳动者个人与劳动者社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完全一致。我们的生产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或者说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理解创新红利就有问题，资本主义的创新红利分配其实就是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阶级关于生产目的或者各自利益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劳动者希望改善物质生活，要求增加工资可以购买的消费品实物量。资本家不会这样理解，他要追求的是剩余价值，是从价值形态去理解这个生产的目的。对他来说，原来剩余价值率是100%，通过创新他必须将收益分割点往左移动，提高剩余价值率，理想的情况是把分割点移动到 T_1 线段的6万亿处，剩余价值率提高到300%，全部创新红利都由资本家阶级占有。这是马克思那个年代比较典型的情况，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没有提高。经济有没有增长？应该是有增长的，但是增长的红利哪里去了？全部给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率会迅速提高，以比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的速度提高。对资本家阶级而言，创新红利的分割点只能左移，那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把这个分割点往右移，比如说移动到 T_1 线段15万亿这个地方，资本家的物质财富增长了没有？增长了，由6万亿增加到9万亿，增长了50%，他物质享受可以增长50%，但是这个增长对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商品价值、剩余价值，他追求的是社会劳动的支配权，追求剩余价值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所得反而降低了。比如说在15万亿这个点上，剩余价值率只有60%，而不是100%。所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利益分割点右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红利分享空间只能在 T_1 线段的 6 万亿到 12 万亿之间，这就是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有人批评说，马克思认为整个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实物工资是不变的。这其实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承认工人生活水平可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但他强调，资本主义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命运，因为资本主义的创新红利分配总是对劳动者不利，剩余价值率只会提高不会降低。这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规律。

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面创新红利分享空间的差异：以图 1 的数据为例，劳动者社会的红利分享空间在 T_1 的 6 万亿—18 万亿之间，它更宽；资本主义的红利分享空间在 6 万亿—12 万亿之间，较窄。6 万亿是工人的底线，再下降他就不能维持劳动力商品再生产了；12 万亿是资本家的底线，如果再往右边移动资本家就不干了，因为剩余价值率会下降。

（三）创新红利分割方式与经济增长动态路径

静态地看，从一次性的创新红利分配来看，劳动者社会的红利分享空间在图 1 的 T_1 轴上 6 万亿—18 万亿之间，这中间的任意一点作为新的利益分割点都是可以接受的，它无非就是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分配，个人少分一点，社会福利可以增加一点。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那么红利分配行为就不是一次性分割那么简单，它变成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会形成持续性的后果。我们把这称做动态路径。以下先考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所谓利益分割点右移，另一种是利益分割点左移。

1. *利益分割点右移*

图 1 中利益分割点 T_0 时期在正中间的 6 万亿处，然而经济增长了，不管增长多少总会在原来的利益分割点的两边出现一个或大或小的红利分享空间，总归要重新确定一个利益分割点。利益分割点右移是什么概念？分割点往右边移动是个人收入实物量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果经济增长的利益始终按此方式分配，劳动者个人所得份额就会越来越大，社会总剩余价值率就会越来越小。这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当前消费生活来说显然是利好。

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出现过，1978 年以后的 20 年，社会剩余（价值）率在波动中下行，原因是改革使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一方面，“大包干”和粮食购销政策的调整极大释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纯收入连续多年以两位数增长。另一方面，企业扩权改革导致工资奖金制度的松动。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速超过 GDP 增速，社会剩余（价值）率连年下降。农村改革特别具有爆发性，致使社会剩余（价值）率从 1978 年的 172%迅速下降到 1983 年的 104%和 1984 年 109%。这是自 1952 年以来社会剩余（价值）率的最低点。此后，随着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企业改革对社会剩余（价值）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按照齐昊的计算，企业单位的剩余价值率从 1978 年的 250%一路下降到 1998 年的150%。[①]1988 年，戴园晨等人在《经济研究》发表

① 齐昊：《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基于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报》2017 年第 10 卷。

论文对这一情形做了精彩描述：一方面，是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幅度远超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另一方面，是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扣除物价因素后仍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强调利益刺激，企业留利在利润总额中的比率不断攀升，从1979年的12.3%提高到1985年的39%，1986年以后实现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留利占实现利益的比例持续提高。据统计，1979—1991年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提高6.5%，超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5.2%的幅度。②企业职工的工资攀比和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形成工资侵蚀利润的强劲合力，成为市场化改革初期难以避免的趋势。

戴园晨等人的文章指出，职工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工资攀比不利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并且可能引发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这是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因此戴园晨等人建议，国家加强对工资总额的宏观调控。现在来看，他们关于工资侵蚀利益危害的分析还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该文发表之后的若干年，工资侵蚀利润持续发酵，对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严重损害逐步显现。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工资对利润年复一年的侵蚀中，企业能有多少利润去发展再生产，去技术改造，去引进新技术？另一方面，那段时间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都放开了，市场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投资能力弱化，大面积亏损不可避免。结果是国有企业不得不“减员增效”，国有经济不得不从小规模生产、小规模经营领域退出。当然，这也是国有经济自身优化布局的需要，但它同时也是微观主体行为扭曲的必然后果。总之，考虑到创新红利分配的长期动态后果，收益分割点右移的策略是不能持续的：一个企业坚持这种策略，它终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一个国家坚持这种策略，则国家经济终将在国际竞争中被击垮。

2. 利益分割点左移

所幸的是，90年代后期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发挥了效果，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和劳动用人制度改革基本扭转了企业内工资侵蚀利润的倾向，加上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到90年代末，工业经济中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企业追求工资最大化的行为逐步转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企业的投资和创新意愿回升，竞争力提高，市场经济更加活跃了，使得我国经济在2000年后进入加速发展期。

一种相反现象，即“利润侵蚀工资”逐渐在企业中抬头。郑志国2008年在《中国工业经济》发表文章，戏剧性地采用了与戴园晨论文截然相反的标题：“中国企业利润侵蚀工资问题研究”。③文章指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企业利润侵蚀工资问题日益突出，其主要方式有企业“压低、克扣和拖欠工资”，“不交或欠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工资构成中“不含或少含住房费”，以“大量裁减员工来减少工资支出以增加利润”等。由于利润长时间侵蚀工资，1995年到2006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中工资占比从22.49%下降为8.63%，下降13.86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企业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占增加值的比例波动，但是总体呈上升趋势。物质生产部门受此影响更大，其人均工资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工资，且差距逐年扩大。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

① 戴园晨等：《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潜在危险》，《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

② 周荧：《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再思考》，《北方经济》1993年第6期。

③ 郑志国：《中国企业利润侵蚀工资问题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1期。

原因是：第一，企业管理者掌握着分配决定权①，他们的利益与利润挂钩，这种激励机制是驱动利润侵蚀工资的内在动因。第二，农村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②，形成激烈的城镇就业竞争，这是工资受利润侵蚀的社会原因。第三，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更多地维护企业投资者利益，对普通劳动者利益缺乏保护。

放到图 1 的轴线上，这就是利益分割点左移，个人收入实物量也有增加，但增速慢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按此方式分配创新红利，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小，社会总体的剩余价值率就会越来越大。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已经造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非公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与利润侵蚀工资相伴随的社会现象是企业关系紧张，劳资矛盾突出，劳资关系受到普遍关注。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反映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 90 年代末突破 0.4 这个“收入差距较大”的临界点，并且继续上升到 2008 年的 0.491 的高点。此后，基尼系数虽有回落，但仍然在 0.47 上下徘徊。③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困难。美国学者巴兰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经济剩余”，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剩余吸收困难是其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只能依靠浪费性消费，包括巨额军费，以及非生产劳动部门的过度发展，如商业广告、金融泡沫等来消耗。④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中也出现了。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开始显露。首先，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一阶段资本形成率达到 45％的高水平，结合资本产出比的升高，以及产能过剩等现象，这一高积累显然已经不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剩余价值实现困难的被动应对。其次，外贸出口成为最初阶段解决剩余价值实现的权宜之计。90 年代中后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比重一直在 2％以上，2003 年以后进一步升高，2007 年甚至高达 9.3％。如大家所理解的那样，这部分国内生产总值其实是国内储蓄，但未形成国内投资，而不得不借给美国人消费。再次，剩余吸收的另一个渠道是“非生产劳动部门抽取”。1997 年之前，我国国民总产值中非生产劳动部门增加值占比大致在 20％的水平，在此之后逐步提高到 2007 年的 30％。2008 年以后，工业产品的国外需求市场萎缩，净出口逐年回落。剩余价值“吸收”的出路集中到国内消费，非生产劳动部门增加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 2015 的 43 ％。⑤这样，依靠非生产劳动部门加快发展，加大抽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有占国民生产总值 20％的剩余价值得到额外的吸收。这种情况能不能持续？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国民收入中非生产劳动部门对剩余价值的抽取仍然占比较低，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距离。但是，收益分配点持续向左移动总是有限度的，非生产劳动部门特别是虚拟经济部门比重继续大幅提高，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① 这里不仅指私营企业，而且也包括实行公司制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② 其实还有 90 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待业。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

④ 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⑤ 非生产劳动部门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非生产部门增加值－固定资本折旧)/(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本折旧)。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非生产劳动部门包括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其他服务业。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和剩余价值实现等现实问题的积累，可以肯定，收益分配点单向左移，社会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持续的。

我们的结论是，劳动者社会的确存在更宽的创新红利分享空间，但是红利分享方式从长期看却是受限制的。两种典型的分配模式——利益分割点右移模式和利益分割点左移模式，都不可持续。社会主义的创新红利分配方式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能得出利益分割点在经济增长中应当始终保持稳定的结论？这是否是劳动者利益所必须？现实中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为进一步推进研究，有必要全面回顾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70年，看看实践的运动能不能对理论有所启迪。

二、向左，向右，向着同一个目标

（一）实践发展三个阶段

由于相关数据的缺失，国内少有人研究70年经济增长中剩余价值率变动的总体情况，但少数研究还是给出了比较清晰的图景。齐昊的一篇首先用英文发表的论文①按照马克思关于企业剩余价值率的定义，计算了全社会生产劳动部门企业单位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如图2所示（按照作者的说明，改革开放前30年没有完整数据，只能给出大致的估计，因此图上用虚线表示）。大体上说，这是一条先上行，再下行，再上行的N形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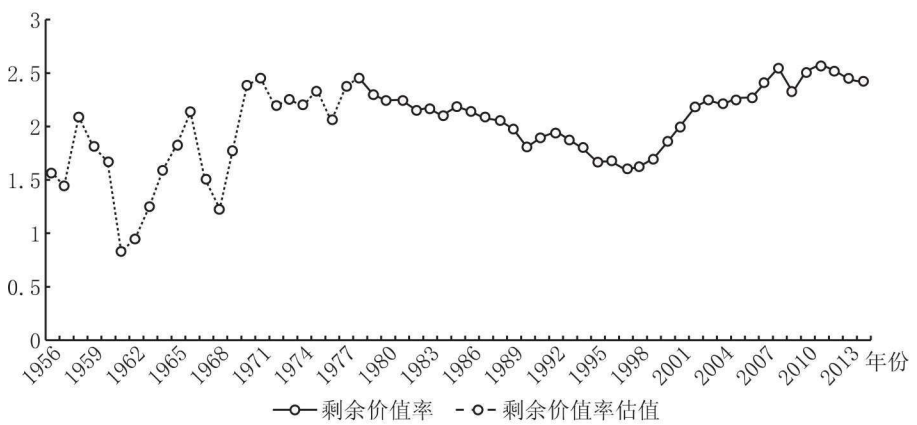


图2　1956—2014年中国剩余价值率

为了讨论宏观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对积累率的影响，本文提出社会剩余（价值）率的概念。齐昊的计算没有包括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在非企业单位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及其比率，对于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总体格局，特别是讨论社会主义原始

① Hao Qi, 2017, "Dynamics of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New Normal' of the Chinese Economy,"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32, pp.105—128.

积累问题，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工业化初期，农民在人口总数中占绝对多数，农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得不依靠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手段，集中农民提供的剩余劳动增加工业投入。工业生产中显示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低价农产品转移到工业利润中的农业剩余。既然剩余价值率的分子计量包含了（也无法剔除）这部分农业剩余，其分母计量就应该包含生产了农业剩余的全体农业劳动者。其次，本文关注的是社会范围的积累与消费关系，从生产部门企业单位剩余价值率不能直接推算出剩余价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对以下讨论会有诸多不便。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经济中全部生产劳动部门（包括农业）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例来定义社会剩余（价值）率。按照社会剩余（价值）率＝（国民收入—生产劳动部门劳动报酬）/生产劳动部门劳动报酬的公式，计算了 1952 年以来部分年份的社会剩余（价值）率，如表 1 所示。由于分部门劳动报酬数据的限制，一些年份的数据只具有估计的性质。

表 1　1952—2015 年部分年份社会剩余（价值）率

年份	社会剩余（价值）率 1*（%）	社会剩余（价值）率 2**（%）	社会剩余（价值）率 3***（%）
1952	121.1		
1957	120.7		
1964	112.9		
1965	135.4		
1977	177.8		
1978	178.5	172.0	
1979	162.2	157.0	
1980	141.8	137.3	
1981	128.6	123.6	
1982	111.0	106.7	
1983	107.4	104.0	
1984	109.8	109.4	
1985		127.7	
1986		131.5	
1987		147.4	
1988		159.7	
1989		159.6	
1990		148.9	1.47.3
1991		168.0	
1992		184.4	196.8
1995			173.0
1997			133.9
2000			146.2
2002			212.1
2005			245.3
2007			239.6

续表

年份	社会剩余(价值)率1*(%)	社会剩余(价值)率2**(%)	社会剩余(价值)率3***(%)
2010			227.1
2012			224 .5
2015			247 .8

注 * 劳动报酬利用行业职工人数与职工平均工资的乘积计算;非公经济职工平均工资数据缺失,按集体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农业劳动报酬按农民纯收入乘以70%反推。

** 劳动报酬利用分行业工资总额计算;农业劳动报酬按农民纯收入乘以70%反推。

*** 劳动报酬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

由于分母包含了农民劳动报酬,我们计算的社会剩余(价值)率比齐昊计算的企业单位剩余价值率数字要小。但二者所反映的70年变动趋势却基本一致。根据社会剩余(价值)率数据,并参考企业单位剩余价值率,我们将70年的社会剩余(价值)率变动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为剩余价值率上升阶段,也就是利益分割点左移阶段。社会剩余价值率在震荡中上升,从一开始的大约120%上升到1978年的将近180%;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为剩余价值率下降阶段,也就是利益分割点向右移动阶段;社会剩余(价值)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从1978年的170%多逐步下降到1997年的130%多(其中1983年最低下探到104%);第三阶段为90年代末开始至21世纪头十年,为第二个上升阶段,社会剩余(价值)率在不到10年时间里从130%快速上升到245%,近年来社会剩余(价值)率保持高位震荡,是否会出现第二个下降阶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总之,70年经济增长中社会剩余(价值)率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均衡点,也不是在一个狭窄区间波动,而是出现多次不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化,剩余价值率高至240%以上,低到将近100%,上下相差120个百分点。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二) 为提高积累率而将利益分割点向左移动

先看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第一个剩余价值率上升期,虽然波动很大,但总的趋势是一路向上。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剩余价值率上升的目的在于提高积累率,冲破"低水平循环陷阱"。低水平循环的意思指在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剩余价值率也低,积累率很难提高。最低限度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要消耗很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其剩余部分一定较少。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中能用于投资的份额很少。剩余价值用于投资之前必须扣除必要的社会公共消费和非生产劳动部门消耗(商业、金融等),即使有点投资,首先还要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抵消,创新红利空间很小,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的提升空间很小,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空间也很小,因此投资率也不可能有什么增长。投资率不高,增长就不可能快,贫困就难以摆脱。这种情况就叫做低水平循环陷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439国际元①,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韩国的57%,中国台湾的47%。"低水平循环陷

①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